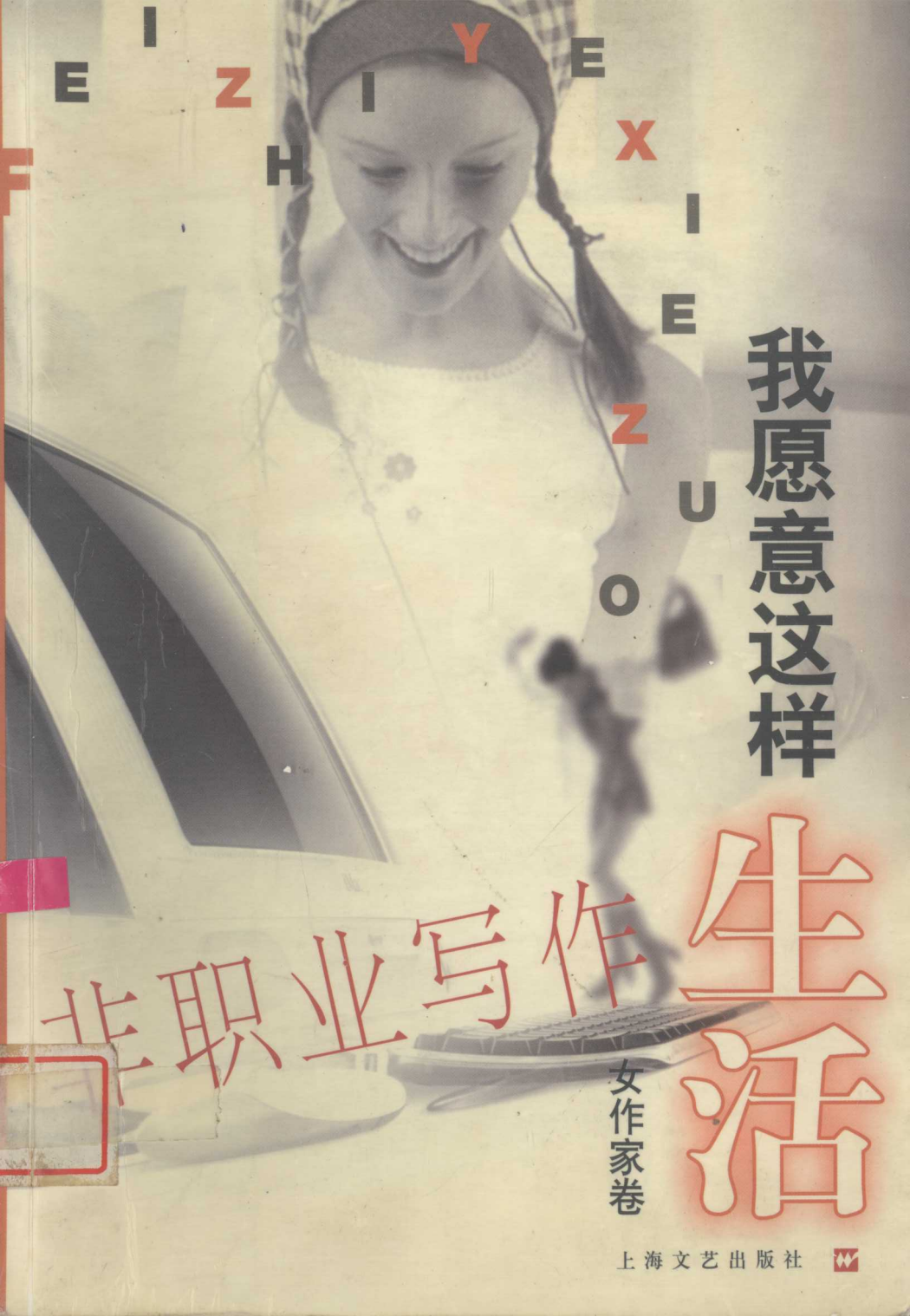




我愿意这样

非职业写作生活

女作家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WOYUANYI ZHEYANGSHENGHUO

非 职 业 写 作

我愿意这样生活

女作家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愿意这样生活/林白、残雪等.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9

ISBN 7-5321-2105-4

I. 我… II. ①林… ②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872 号

责任编辑: 郑 理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我愿意这样生活

林 白 残 雪 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500 册

ISBN 7-5321-2105-4/I·1709 定价: 10.00 元

WOYUANYI ZHEYANG SHENGHUO

非职业写作
我愿意这样生活

目录



- | | | |
|---------------|-------|-----|
| 如此绝对的方式 | / 丁丽英 | /1 |
| 我是怎样成为自由职业作家的 | / 王 芫 | /7 |
| 阳光、空气与梦 | / 丹 羽 | /23 |
| 写作是把钥匙 | / 冯晓颖 | /31 |
| 自由撰稿——在房间里梦游 | / 叶 弥 | /38 |
| 水性而自由的写作 | / 刘燕燕 | /43 |
| 做一个快乐的自由人不容易 | / 林 白 | /53 |
| 穿行在城市 | / 赵 波 | /56 |



诗的鱼群

/ 赵 霞 /81



自由是我拼命争来的

/ 赵 凝 /93



看着天亮

/ 周洁茹 /102

我的朋友是红狐

/ 虹 影 /113

悲悼

/ 张人捷 /117

把生活变成艺术

/ 残 雪 /122

让文学给家园点灯

/ 曹明霞 /129

从无止境

/ 黄 茵 /141

一个人的写作与生活

/ 魏 微 /154

以写作的名义发呆，并且发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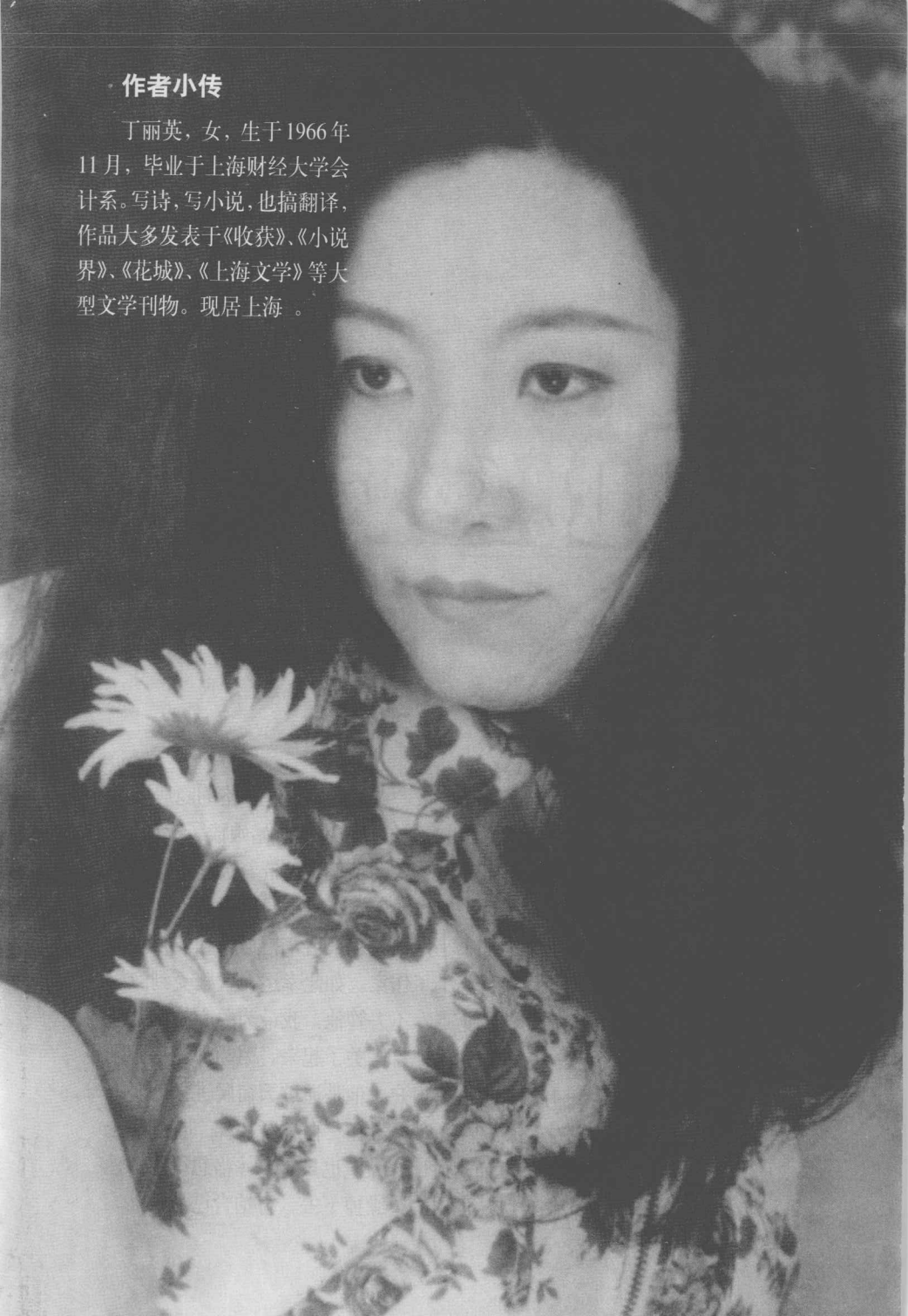
/ 戴 来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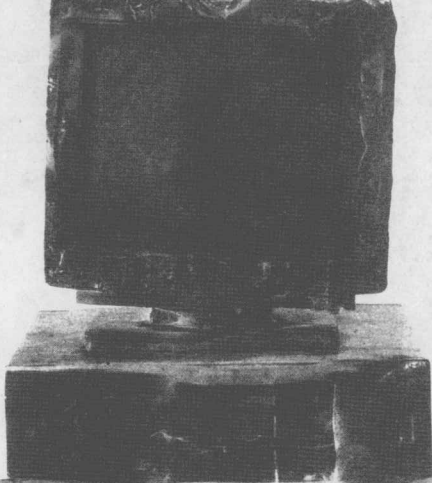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小传

丁丽英，女，生于1966年11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写诗，写小说，也搞翻译，作品大多发表于《收获》、《小说界》、《花城》、《上海文学》等大型文学刊物。现居上海。





如此绝对

丁丽英

的方式

后

后来终于传来一点消息，说塞林格的隐居生活不外乎这样：和一个年仅17岁的小姑娘谈了次恋爱，虽然最后不得不分手；每天清晨带着饭盒，跑到一间小房子里去写作，不管写得出写不出，不到天黑不出来。那个小姑娘大起来后，把这场恋爱狠狠地写了一通，当上了作家。如此幸运，大概受到隐居大师的特殊指点。不去管他。我最为关心的倒是后面一桩：塞林格把自己关了起来。因为那幢房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他是通过天窗爬进去的。一进去，就按了个什么按钮，撤掉了扶梯，直到晚上才恢复。如此设计，大概也只有塞林格想得出来。他害怕自己从麦田的边缘掉下去，害怕自己从缺乏写

作的空虚中掉下去，因此要这样一刻不停地守着、候着，好像和尚闭关打坐，强迫自己入静。这古怪的生活方式，一时竟让我深深地着迷起来。

但早先，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写作那会儿，根本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连伍尔芙所说的那个必要的“单独的房间”都没有。很可怜。那时模仿最多的是卡夫卡，为自己找到若干病症，请了假到公园或图书馆里去读或写，要么白天上

班，夜里才开始

真正的工作。

后来证明

这种方式

非常有害。

人会变得日渐

虚弱下去，涣散，写

出的东西没有保留价值，多半撕了。

我感到焦虑，同时感到生命正在无谓地耗费，很令人痛心。那时我工作的办公室，因为是财务科，怕失窃，所以窗户上每隔两寸就安插一根钢条，水平方向上也是如此。栅栅栏栏的，很难看，有种蹲监狱的感觉。那间办公室里摆着掉了漆的笨重办公家具，暗黄的帐簿，装订用的钻孔机，以及盛凭证单据的木匣子和锈迹斑斑的保险箱，还有戴着袖

套笼、表情严肃的同事们，他们用特细钢笔记帐。静寂中，不时传来激烈的算盘珠子声，噼噼啪啪，敲得人心里直发慌。每当我站在窗前眺望，也只能看见江湾体育场那高耸的照明灯架，孤零零的，仿佛一只发不出声音的话筒。四周全是灰灰的平房和坚硬的围墙。而在室内，你竟可以一年四季观察同一只蜘蛛在墙角，如何辛劳地吐丝，如何织网，如何悠闲地繁衍后代。

就是如此

单调乏味的生

活。只有发薪的

日子最热闹，

充满过年的气

氛。所有人都开

始数钞票，成捆成

捆的钞票，开着车上银

行提来的。外面贴着封条，扎着细绳子，掷到桌上沉甸甸的，有点像书籍，有点像纸张。如果是簇新的钞票，都是挺刮的，锋利的，数的时候不小心还会割破手指。那时我想入非非，假想自己拥有这样一捆钞票，那就再也不用到单位来上班，浪费时间了，说不定我还能写出同样的一捆书来作为替代呢。朋友们也总对我开玩笑，问我什么时





以偿了，但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我早就向往的生活，竟是一种没有了退路、穷途末路的生活。很少有人愿意尝试。我将不得不面对窘迫的经济压力，感受一种体制外的无安全感。

我借了一间房。每天早晨带上包和一只不锈钢杯子，骑一辆破自行车来这儿写作。杯子里盛的是午饭。零食或水果都不带，是为了避免可能的分心和贪婪，因为其中任何一条原因

都会导致体重的增加或写作的半途而废。我可不想那样。我甚至还郑重其事地把这里命名为“工作室”，把自己弄得像一位艺术家，好像他工作，除了自己的脑袋，还需要许多额外的工具似的。过去对作家的印象可不是这样。过去作家只需要一支笔和几张纸。现在两样了。我们都习惯用电脑和打印机。每天写完的东西都要打印出来，或者存在磁盘上带走。为了保住劳动成果，一些措施还是必要的。我的工作作

候大起胆子来贪污一把，那样就会有钱，好开始写作，他们也能跟着沾点光。钱，变得异乎寻常地珍贵起来，似乎决定了一切。我甚至还想到去傍个大款什么的，只要能够写作，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来的。

这样苦苦地挣扎，犹豫，彷徨，后悔，几年下来一事无成。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该下决心了，要不，一切都将太晚。于是我离开了单位。我知道这是在对自己下毒手。我不给自己留有退路。你看，虽然我如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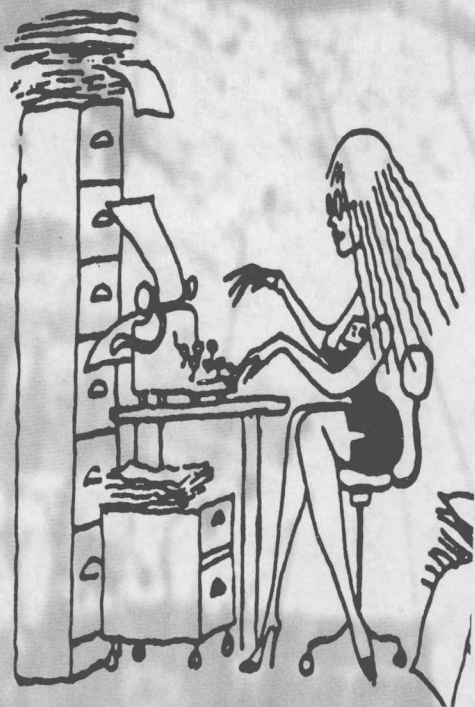
风仍然严谨得像个财会人员，时刻做好电脑被毁的最坏打算。

从家里到这儿来的路上，总经过一家冥纸店，门口摆着一个点心摊。在“寿衣香烛”的幌子下，葱油饼生意竟十分红火。我总是一块钱买两个当作早餐，同时想象着，无数鬼魂正簇拥在摊前，无形中早已分享了我的食物，不禁惶恐，多疑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离开单位以后常有的，失道寡助似地，不免把前途想得有点暗淡。

反正一个人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一点我并不后悔。其实它也没法后悔。我不可能选择第二次，从头再来。为了写作我已准备了十几年。一旦干上了，却发现这十几年，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它的作用正在衰退，影响范围正在缩小。即使这样，他仍然是我最钟爱的情郎，他又是我的丈夫。我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替代。有时我又把它当作一个自产自销的手工“小作坊”，是我惟一的生存手段。

很多著名作家的传记里都写到，他们旅行、谈恋爱、游玩，千方百计不接近那只摊着文稿的写字桌，只有失恋或凶恶的债主才能使

他们重新回到那寂寞的角落。可以说，许多世界名著都是不得已的结果。而贫困或相对的冷落倒是成功的好助手。非常有意思。当我独处的时候，也经常免不了在房间里溜达，望野眼，做些无聊的小动作，甚至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我知道自己是在尽量拖延。因此一个监狱式的房间显得必要极了，再怎么，我不能轻易地离开。到一定时候，所有无聊事都干完了，我自然还会坐到电脑前敲上那么几行字。如果不这样记录下来，许多美妙的构想在脑袋里一闪也就消失了，再也不存在。事件只有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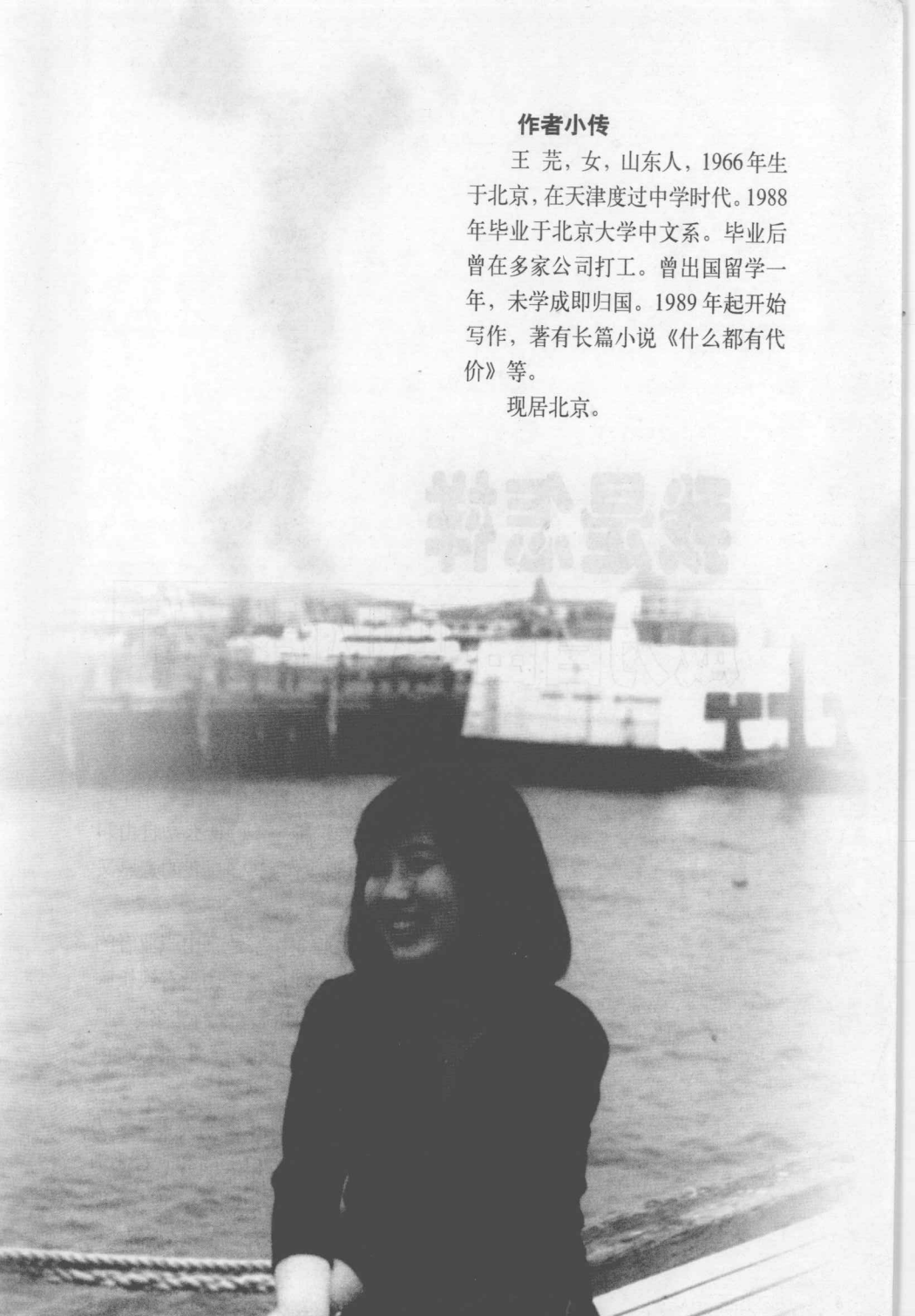
在文字里才成其为事件，否则的话，它们会随时变形、增减，到最后就面目全非，损失殆尽。

因此我并不羡慕别人在国外的露天咖啡馆写作，虽然很有风情，但我想那会很吵，很不适合我。写作是一桩进入到内心深处的工作，每当埋头在里面的时候，外界对我来说几乎是密闭的，连视线和打字的手都没有注意到它们在移动。所以我需要四周有一个绝对安全的空间。铁门反锁着，看不出里面有人，也不放任何音乐，不发出任何声响。静谧。安宁。绝对地见不得人。我乐意这样一如既往，占据自己身体一样占据这种生活，我希望自己因此也变得纯粹起来。每当幸福的灵感降临时，我就能幸运地率先捕获它，用的是如此古老又如此绝对的方式。

作者小传

王 荒，女，山东人，1966年生于北京，在天津度过中学时代。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多家公司打工。曾出国留学一年，未学成即归国。1989年起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什么都有代价》等。

现居北京。



王小章

生平 1991 入京山，文，生 王
1991 升任华中长篇小说家，北京于
日业半，泰文 中华大京非下业半
一等晋国出管，工部后公京非下业半
候书强半 1991，国日即强半末，平
升晋强公付》王小章牙晋善，晋

第《价

京非强

我是怎样 成为自由职业作家的

王 尧

我 我是怎样成为自由职业作家的？
我首先得声明：成为自由职业作家并非我的意愿，其次我得来辨析一下：什么是自由职业作家？在成为自由职业作家之前，我的意愿又是什么？

顾名思义，自由职业作家是自由职业者的一种。而自由职业者，理应是一切没有铁饭碗的人的通称。但在具体应用上，又有诸多限制。比如以下几种人，虽没有铁饭碗，但不算自由职业者：

第一，辞了公职下海作生意的人不算。为什么不算呢？没有人能解释，但人们普遍有这种感觉：一提起“自由职业者”，脑海中绝不会出



现有产者的形象。我对此有个开玩笑的解释：作生意的人都得有资本。而按照我们对资本的通常理解，这玩艺儿能使人异化。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资本，你将欲罢不能，想不把生意接着作下去都不行，因为资本不答应。所以谈不到自由。

第二，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不算。农民为什么不算呢？也许有人会解释说：农民是拥有土地的。但是请注意：土地是国家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他们既然有使用的权利，也就应该有不使用的权利。当种地收入不如打工收入高时，他们就选择打工，所以他们应该算自由职业者。如果有意把农民排除在外，则只能说明农民的不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被束缚在

土地上。但我们把农民排除在外通常不是有意的，而只是一种疏漏。

第三，在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也不算。众所周知，白领的饭碗并不稳当可靠，经常听说某某被老板炒了鱿鱼，或者反过来，某某炒了老板的鱿鱼。这说明白领时刻和资本家进行着双向的选择，他们应该是自由职业者。可是结果仍然是“第一”一样：一提起“自由职业者”，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白领。

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一个“自由职业者”鉴定委员会存在，可是“自由职业者”这个词儿却约定俗成地反映出一类特定人物的面孔：城镇居民，有一定学历，没有组织，孤军奋战。“没有组织”和“孤军奋战”这两个条件说明了“自由职业者”的自



雇性质：既不能雇佣别人（包括资本）也不被别人雇佣——以此区别于生意人和白领；“城镇居民”和“有一定学历”这两个条件表明了人们对“自由职业者”的一种惋惜之情，即：这些人本不应该成为“自由职业者”——以此区别于农民。

既然“自由职业者”是一群“城镇居民，有一定学历，没有组织，孤军奋战”的人，而这群人也得养家糊口，所以他们卖文为生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其他职业，哪怕

是在歌厅伴唱，也得按时上下班，不得无故迟到早退。自由不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自由职业作家”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行当。我1988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那时我虽然想成为一个作家，但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生活经验不足，因此要“体验生活”。我的理想是：在我把生活体验了之后，去当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专业作家”。“有中国特色的专业作家”的特征是拿着作协的工资，作品写成之后稿费归自己。早年间作这种人可能还

有义务，比如逢到“四清”时节，上级会布置下任务来，让你写一篇关于“四清”的小说等等。在我萌生理想的1988年，作家们似乎连这样的义务都没有了，只有权利。假如你承认人的天性有趋利避害的一面，你就会同意我的推论：没有一个“自由职业作家”不想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专业作家”。可是据我所知，随着各行

各业改革的深入，这样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最终很可能为零。从1988年到现在，我经过了十



一年而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我并非特别笨或者特别懒。只是因为时代变了，轮到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能混成“有中国特色的专业作家”的已经寥寥无几。

1988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到了北大属下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事实上这是一份体制内的职业，可是我当时竟对它有误解：我以为这是一份自由职业。

我的判断来自于一些表面现象。在大四等待分配的最后几个月，我在学校的布告栏里看到了那家公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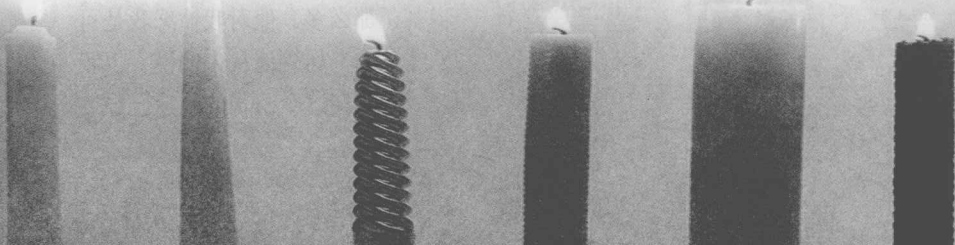
招聘启事。我于是前去应聘。我向管人事的副总经理，实际上是某个系的副教授介绍自己的情况：“我于1984年考入计算机

系，八六年转到中文系，所以我文理兼通”。我隐瞒了我从计算机系转出来是因为电磁学和光学考试不及格的事实，也隐瞒了我转入中文系后由于缺了两年的基础课因而基础很薄弱的事实，也就是说：事实恰恰与我的自吹自擂相反，我是文理皆不通。但当时这样的学生还不太多，听起来挺唬

人的。那个副总经理就记下了我的名字，让我回去等通知。到毕业分配前夕，有个学生跑到我的宿舍来通知我：“你被公司录取了。”我于是就对系里管分配的老师说：“我自己找到单位了，你们别分我了。”

那一年，我认识的几个从计算机系毕业的同学因为分配不理想，就把档案、户口什么的全都抛弃了，开始在中关村辗转打工。我也以为我这份职业的性质和他们的一样，是市

场经济下的一份自由职业。其实我是按照国家干部正式分配的程序分到北大的，这背后有一系列操作：比如给我们申请留京的户口指标，申请干部指标，把我们的档案从学校转到单位等等。只是因为这家公司碰巧是北大自己办的，所以我的一切材料都是从



管学生的老师那儿转到了管干部的老师那儿，没出校门，用不着我自己操心。因此我不了解内情。

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或朋友问我：“你的关系在哪儿？”我都潇洒地说：“不知道。”我自以为是个把一切都抛弃了的人，但其实我的关系就在北大。我是一名国家干部。这种糊涂认识终于使我吃了亏。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国家干部身份，所以我也意识不到我所供职的那家公司本质上是国企。即使与日本人合了资，也改变不了中方总经理是在代行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这一事实。我当过一段时间的总经理秘书，而我在打印总经理给董事会写的报告时，不小心把文件留在电脑里，没有删除。那份报告上透露了总经理的月薪。公司里一时间

沸沸扬扬。总经理不得不多次在会上向大家解释：“那是名义工资，因为我们是中外合资公司，所以中方总经理得和外方总经理对等，实际上我没拿到那么多钱。我拿的还是北大发的作为副教授的工资。”无论他怎样解释，听者脸上都挂着神秘的微笑。

可想而知，总经理再也不肯信任我了。

时至今日，每说到国企改革，我就常常想起我的这一段经历。有时看到海尔的张瑞敏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我就想：他到底算海尔的什么人呢？是国外那种 CEO（首席执行官）呢？还是他个人持有海尔的股份呢？假如都不是，只是海尔的这一届领导而已，那么他退休以后，换了一届领导，海尔还能像现在这样辉煌吗？我还能放心地买海尔牌的电器吗？

换言之，国企领导的人力资本到底值多少钱，即使到了现在都世纪末了，也没有争论清楚，所以我在1991年给那个总经理带来的麻烦便可想而知。那确实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前途，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他真拿了那么多。他对我愤怒我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从未明说，但我知道：我在这个公司的前途已经终